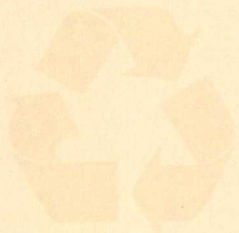


百家文丛



中国古代生活哲学

ZHONGGUO GUDAI SHENGHUO ZHIXUE

李国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代生活哲学

李国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生活哲学 / 李国祥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12

(百家文丛)

ISBN 7-5034-1754-4

I. 中… II. 李… III. 人生哲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4335 号

责任编辑: 李春华

封面设计: 孟祥成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刷装订: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 101109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5034-1754-4/G·0366

全套定价: 18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概述	(1)
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生活趣味	(12)
第三节 生活哲学的理论渊源	(24)
第二章 饮食有道	(35)
第一节 概述	(35)
第二节 饮食哲理	(41)
第三节 儒家饮食	(58)
第四节 道家饮食	(74)
第五节 佛家饮食	(82)
第三章 服饰有理	(95)
第一节 概述	(95)
第二节 服饰哲理	(98)
第三节 儒家服饰	(104)
第四节 道家服饰	(110)
第五节 佛家服饰	(114)

中国古代生活哲学

第四章 山水有德	(117)
第一节 概述	(117)
第二节 山水哲理	(121)
第三节 儒家与山水	(128)
第四节 道家与山水	(132)
第五节 佛家与山水	(153)
第五章 花木有情	(163)
第一节 概述	(163)
第二节 花木哲理	(166)
第三节 儒家与花木	(196)
第四节 道家与花木	(200)
第五节 佛家与花木	(203)

第一章 导 论

哲学是人类和时代精神的精华，世界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但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人类从有文字到能自觉地进行哲学思维所走过的路程，比之从蒙昧到文明更加艰难。作为整个人类和一个民族抽象思维发展和成熟的成果和标志，哲学蕴涵了人类和这个民族文化的本质和精神，体现了人类和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生存方式，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堪称世界哲学的典范。中国哲学的价值与特色就在于：注重人的生活内容与方式、追求生活的理想与趣味，是关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哲学。

第一节 概 述

中国哲学蕴涵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和精神，体现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生存方式。中国传统哲学，

中国古代生活哲学

主要包括儒、道（含道家学说即老庄哲学和道教思想^①）、佛（佛教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包括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历史观和人生观等，中国化的佛学当然属于中国哲学）三家，从总体上讲，是关于人的生活的哲学，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有着重大区别。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而不是物质规律，它的核心是人生观而不是宇宙观或认识论。中国哲学特别注重人和人的生活，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其最高宗旨是寻求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可以这样说，人生问题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各派哲学几乎均以关于人生的论述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重点，研究最深、讨论最多的都涉及人生问题，正如张岱年所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哲学以人的实际生活为起点，以人的本性和精神为中心，对有关人的生活与活动给予高度重视，构建了自己独特的以注重现实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生活哲学，从而与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其他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在人类哲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从哲学研究的总的方向和精神来看，中国传

^①严格地讲，道家哲学与道教并不相同，前者是世俗文化，产生于先秦，其主要内容是试图超越物我、超脱生死、否认人的能动作用；后者是宗教文化，产生于东汉，其主要内容是试图借神力扭转乾坤、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追求长生。但两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两者内容的相似之处毕竟大于其区别，如：两者都主张天人合一、任物自然、追求人类与个体的无限完美等。道教还奉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庄子为教主，尊道家经典《老子》和《庄子》为道教经典，分别称为《道德真经》和《南华真经》。因此，道家哲学和道教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本书合称为道家。

第一章 导 论

统哲学是以人的生活为总特征的一种人生哲学，这种特征也可表述为“以人为本”，即以人的现实生活及其体验为出发点和主要内容，这种特征显然不同于一般所谓的“人本主义”。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与主要追求在于认识、参与和体验人的生活，包括社会现实生活、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诸方面。因此，我们可以把人的生活当作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与总的特征，把中国哲学称为生活哲学。中国生活哲学关于人的生活的这个总特征可以有多方面的展开和表现，以下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哲学的总特征，以此作为考察中国哲学的生活趣味和理论渊源的基础。

其一，“治人为本，治物为末”。在古代中国，“治物”通常被认为是小人的事，“治人”才是君子的事。所谓“治物”，指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情、解决具体问题的活动，包括工农业生产、交通贸易、建筑施工、科技研究等活动；所谓“治人”，大体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处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活动。“治人”意味着对人和生活的控制，这种控制必须以政治权力和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为前提，因而政治问题一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都集哲学、政治、伦理与历史的反思于一身，他们都要求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来生活，他们的行动构成他们的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哲学要求他们身体力行，他们本人就是实现自己的哲学及政治伦理主张的工具。

儒家创始人孔子，既是哲学家、思想家，又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是教育家、养生专家。他的学说以“礼”为出发点，而“礼”是一个揉政治与伦理为一体的传统概念。“礼治”、“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原则立场和基本观念。《论语》一书中，直接论“政”的，共有22处，而“政”字出现得更多，达到41次。孔子以维护政治传统和社会伦理的姿态出现，力图使

自己的思想不带有个人的性质，使得他的主张容易被社会所普遍认同，尤其是被以正统自居的统治者所认同，由此成功地使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进而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

从表面上看，道家似乎是消极避世、远离政治的，其实并非如此，道家远离现实和政治的行为本身即包含了在思想上对现实和政治的一种独特看法。事实上，道家不仅关心政治，而且能从历史高度议政论政，提出了许多具体而独特的政治策略、计谋和手段，以致有人把道家学说称为“君人南面之术”。在《老子》一书中，直接议论如何治“国”的有 21 处，如何治“民”的，有 33 处，而论及“天下”的多达 56 处。由此可见，道家实际上也很重视政治活动，也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精神和远大抱负，只是在政治原则与实践方法上与儒家有很大的区别罢了。

中国哲学以政治和伦理为研究的起点，与西方哲学以自然科学为研究起点相比，层次并不低，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哲学研究的层次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之后》之类著作的研究层次更高、更难。自然现象总的来说条理清楚、黑白分明，比较容易鉴别和把握；社会现象则不然，其复杂、治乱、安危、变更，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需要认识者具有很强的认识、体悟、把握和思辨能力。政治问题不仅涉及道德、理想、历史观、价值观等问题，还包含着技术性、操作性内容，涉及方法论问题。因此，中国哲学家普遍认为，“治人”难于“治物”。人处在知觉的动态交往和普遍联系之中，很不容易“治”（更不用说达到“大治”、“至治”的理想目标）。人皆有欲、有智、有能动意识，因而有很强的“为乱”能力（掌权者的“为乱”能力最可怕），同时还能够结成群体，形成集体“作

第一章 导 论

乱”的能力（如割据势力等）；而“物”则不具备这些特点。因此，“真正”的哲学，应该研究“人”本身，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应该研究人的种种相互关系，应该探求最佳的“天下大治”方案，寻求“人和”模式，以“治人”为本，以“治物”为末，而决不能陷入于“物”的研究之中，以至迷失方向、“玩物丧志”。中国哲学的这种思想，尽管有一定片面性，甚至给中国文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性，为人类哲学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中国古代哲学从总体上注重政治伦理活动，可以更好地替代西方工业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依靠基督教劝善、协调关系的功能，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

其二，重德轻智，重生轻神。西方的“哲学”一词，源出希腊文 *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按黑格尔的说法，“哲学”一词的最早使用者是毕达哥拉斯，原意包含“爱”与“智慧”两方面的内容。显然，这种“哲学”的定义，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本质特点，不是“爱智慧”，而是重道德、轻智慧。中国哲学的最高目的据说是“成圣”，最高的哲人就是圣人。“圣”在汉字中最初有聪明智慧的涵义，所以《说文解字》释其本意为“通”。但经过哲学家们的解释、使用和发挥，其基本意义却变成“德”了，而与“智”相去甚远。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

在古代中国，哲人、圣人，主要是一种道德的楷模、理想的人格，并不具有智慧的含义。先秦每一位大哲学家，都认为圣人与王者最好是同一个人，有圣人亲自承担“治国平天下”的职责，那就是最理想的政治。所以，很多中国哲人所描绘的“理想国”，都有“哲学王”来领导。在孔子看来，如有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不是一般的仁人，而是“圣人”。古希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是知识型、理论型的，而中国的“哲王”、“圣王”则是道德型、实践型的，两者有着极其鲜明的区别。孔子本人也被后世的人们尊为“圣人”。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将孔子列入帝王范围，其他所有的哲学家只能入“列传”类。两汉以后，孔子的“素王”、“文宣王”等称号，有增无减，后人以此来弥补孔子生前未能做国王的缺憾^①。

许多中国哲学家不仅不爱智慧，反而有一种轻智慧、乃至贬智慧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道家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老庄的“理想国”，其实是一种“愚人国”。在这种理想国中，“圣王”要以身作则，带头愚化自己，同时也要以“愚化”作为治国治民的根本方法。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十八章）。就是说，智慧与道德是根本对立的，智慧必然败坏道德，智慧的发展就意味着道德的退化。可以说，智慧与道德的矛盾与二律背反，始终深深地困扰着老子与庄子的天才的头脑，是他们思考“人”和整个道家思想体系的一个总的理论前提和基本原则。在《老子》一书中，论“智”仅7处，论“圣人”共32处，皆有明确的贬抑智慧、否定机巧的倾向。如：“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第十二章），“绝学无忧”（第二十

^①孔子生前不得志，死后却风光无限。从汉武帝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以后，历代帝王不断给孔子各种封号，如：汉平帝封其为“褒成宣尼公”，北魏时封其为“文圣尼父”，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唐玄宗还亲自作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鄆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自唐代开始，孔子被称为“圣人”。清朝皇帝觉得仅封孔子一个人为王还不够，进而追封孔子先世五代皆为王，即启圣王、昌圣王、贻圣王、裕圣王、肇圣王。

第一章 导 论

章)，“绝圣去智，民利百倍”(第十九章)。这就是说，“圣人”治理天下，要简化民众的头脑，填饱民众的肚子，强化民众的筋骨，永远使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这样，即使是聪明人也不敢妄做主张。因此，“圣人”一定要“为天下浑其心”。

老子的这个思路被庄子所继承，在庄子那里，进一步把所谓“浑沌”当作一个表示人及人类最高境界的范畴。显而易见，在老庄的“理想国”中，谈不上开发“民智”，同时也谈不上开发“君智”，因为国君必须从我做起。在道家看来，连哲学家都应以愚为上。哲学家与众人的不同，就在于他有一颗“愚人之心”。即使别人都玲珑剔透，只有他一个人是昏昏的、闷闷的，因为他已经脱尘出俗，达到了“道”的高度。而超越了一切聪明的“昏昏闷闷”的大智返愚者，应是国王的楷模，国王就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一个超越了智慧、拒绝运用智慧的国家，才能成为得道之国、至治之国。

儒家在智慧与道德的关系上，态度比较中庸，基本是兼顾的。但即使是儒家，在“德”与“智”之间也有明显的扬“德”抑“智”的倾向性。孔子认为，德是做人的关键与核心，智应该从属于德，为德服务。因此，孔子即使论智，也始终是以德为前提和目的。

一般说来，中国的哲学家都不愿意做智叟。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觉察、体悟到，机巧、智慧在社会、人生中存在着消极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非常严重的。他们崇尚道德价值，有意用道德化的手段来抑制智慧化的追求。著名的愚公移山故事，说明了维护好子子孙孙之间的道德伦常关系比什么都重要，道德因素是获取成功的关键，而智慧因素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微乎其微的。贬低智慧，必然贬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客观上有脱离某种社会道德制约的倾向，

乃至有一种非道德的倾向。儒家认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所以它坚决反对“奇技淫巧”，即使对“小人”也不例外。道家走得更远，道家对科技进步持彻底否定态度。老庄认为，人类的科技成果不是人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而是人类给客观世界带来的灾难，因而主张封存一切科技手段乃至文化成果，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去。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片面和荒谬的，给中国哲学和科技发展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

与重德轻智相联系的是重生轻神，即重视人的现实生活，忽视神的存在与信仰。中国哲学注重包括政治伦理和日常活动在内的现实生活，具有比较明显的无神论倾向，冲淡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以致中国未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的道教，不属于纯粹的宗教形态，它与一般宗教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它的信仰目标是成仙，即追求个人的长生不老；第二，它的信仰方式是炼丹、采药之类活动，即古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这两者都是与一般宗教的精神和原则不相符合的）。即使外国的宗教从国外传入，也要被“中国化”，即在中国哲学的影响下，发生损益、变形，否则就难以在中国立足、发展，如：印度的佛教。事实上，古代中国人的许多观念与宗教观念是不协调的，如：他们的鬼神观念就与真正的宗教精神完全不同。在中国人看来，神，是被供奉的对民众利益有卓越贡献和德高望重的人；鬼，则是指无功的古人，只能由他自己的子孙祭祀。这样的鬼神观念，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色彩和家庭伦理的气息，没有具备宗教信仰所必需的抽象思维能力，也与一般的宗教精神相去甚远。

中国哲学家几乎都有一种淡化神的倾向。道家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没有人格的，不是神灵的别称。《老子》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

第一章 导 论

焉。”（第二十五章）“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第六十章）这就是说，道仍然是“域中”的四大之一，它没有超出自然而成为自然的主宰，它不是超自然的神灵，以道来治理天下，则传统观念中的鬼神就不起作用了。道家反对天道有知，强调天道无为，“天地不仁”（第五章），因而具有较为彻底的无神论倾向。

儒家对鬼神的态度则比较中庸，孔子既有一种无神论倾向，又没有断然否定鬼神的存在，对鬼神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基本上是存而不论。“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承认天有意志，但往往把天这个概念加以感叹化、空泛化，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当谈及他为什么“多能”，孔子明确否定了天的援助，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由于孔子在神的问题上观点比较模糊，不十分明确，儒家后人便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派在孔子所保留的天之神秘色彩上做文章，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坚信异常的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有内在的联系；另一派则坚持孔子的无神论倾向并加以发展，当佛教进入中国后，便与玄学的无神论思潮相呼应，形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佛论战。

中国哲学中的无神论倾向，对中国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信仰观念比较淡薄，他们更关心日常生活和实用目的，对抽象的精神实体兴趣不大。一般来说，汉族是典型的无神论民族；但对自己有用时，他们又什么神都可以信，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为了治病、发财、生子、消灾等实用的功利目的，他们纷纷求助于宗教，如俗语所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一旦对自己不利时，他们又敢骂任何人，包括天王老子、

神仙皇帝。在这样一种重生务实的环境中，无法产生出一种真正的宗教，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其三，注重情感体验，轻视逻辑推演，这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突出表现。情感问题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对于一个没有情感的人来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灰色的，生活因而是毫无意义的。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人的情感，把情感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形成了重情感、重快乐的中国哲学特色。

儒家哲学是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的，孔子提倡的道德情感是以孝和仁为主要内容的，孟子进而提出“四端”说^①，把四种道德情感作为人性的根源，这一思想成为儒家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表面上看，道家主张“无情”，它不是情感型而是理智型的。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道家所反对的，只是儒家的道德情感，而不是一般地反对人的情感。老子反对“仁义”，但主张“孝慈”，否定情感中的道德内容，积极提倡纯粹的自然真实情感。庄子反对世俗之情，提倡超伦理的自然之情，即“无情之情”。佛教虽然否定情感，提倡绝对超越情感的束缚，但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却并不否定现实的情感活动，禅师们可以在世俗生活和山水之间体验佛的境界，以至有些理学家批评禅宗虽说是“无情”，实则为了“私情”。

中国哲学重视情感，既有感性的层面，也有理性的层面，既有感性的快乐或享受，也有超越感性的追求与艺术的审美，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其最高体验是所谓“乐”。道家提倡“至乐”，儒家提倡“孔颜之乐”，佛家提倡“极乐”，它们都不

^① 《孟子·告子上》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第一章 导 论

是指感性的情感快乐，而是指一种精神愉快、精神享受。只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才能真正享受到这种快乐。道家以“体道”为至乐，道是没有私情的，是绝对普遍的，它是生命存在的最高本质，也是人生价值的根源，只有在生命的最深处进行体验，才能与道同体，实现人的本体存在。这是一个情感不断净化与纯化的过程，并非感性的体验或逻辑的推演所能比拟的。儒家“孔颜之乐”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情感的最高体验。孔子“求仁得仁”，颜渊的“不违仁”，孟子的“反身而诚”，就是这样的体验。仁与诚不仅是伦理道德，而且是一种客观的宇宙情怀。仁是生命所具有的，既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命之流，并不在身心之外，因此要体之于身，体之于心，用朱熹的话说就是“在自己身上着切体验，”体验、体会、体味都是情感的投入，性情的陶冶，同时伴随着认识，其结果就会得到一种“乐”，这是自我超越的内在体验，不是一般情绪感受。禅宗也描述了“极乐”，它是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一种精神状态。

我们说中国哲学注重情感，并非指一切情感，中国哲学家对不同情感的态度和评价是不同的。情感是有不同层次的，有感性的情感，如情欲、情绪；有理性化的情感，如情理、情义；还有超理性的情感，如神秘体验、宗教体验。关于感性情感，中国传统哲学虽然承认其存在，但是并不提倡；对于私情私欲则是批判的。它所提倡的是自我超越理性化的情感。比如美感体验，中国哲学并不重视具体的感性美，而是具体中的抽象，即所谓“意象”。庄子说：“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所谓“天地之美”即审美体验，是一种情境或意境，而“万物之理”即是客观事物之理，主观与客观是统一的，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它显然是理性主义的美学思想。陆九渊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心性情合一之理，是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统一，也是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至于宗教情感及其宗教体验，则是寻求人生的终极意义和归宿，中国哲学不是将人的情感客观化为彼岸的人格神即上帝，而是在主体自身求得解决，此即所谓“安身立命”之学。从孔子的“知天命”到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都主张反回自身，通过内心体验，勿需逻辑推演，就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道家庄子所谓“天在内，人在外”，也说明天道内在于人而存在，“心斋”、“坐忘”就是内在体验的重要方法。佛教天台宗的“自性说”、禅宗的“明心见性”说，都说明佛性在自家心里，是自家本有的“无尽藏”，不需外求。在有限中实现无限，在暂时中探求永恒，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情感的快乐，不需要什么精确的逻辑论证，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鲜明特色。

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生活趣味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格局是儒、道、佛三家，它们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其中，道家主要追求自然与人生之真，儒家主要追求人生与道德之善，佛家主要追求人生与理想之美，三者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又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中国生活哲学体系，表现了中国哲学对人生的关怀和理想生活的向往，表现了中国哲学浓郁的生活趣味。

一、天人之趣：“天人合一”

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家将这种关系称为天人关系。在中国古代，天